

福建方言与福建文化的类型区

*** ** * 李 如 龙 *** ** *

方言与地域文化

语言是协调人类社会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交流手段,是帮助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切成果都借助语言加以记录和认定,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和文化是同时产生、同步发展的。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半个世纪前曾经说过,“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语言不仅仅是思想感情的反映,它实在还对思想和感情产生种种影响。”可见,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文化产生各种影响。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作为民族语言的地域变体——方言,自然也在地域文化紧密相关。

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可以作微观的考察。例如,某些作物的名称和传说记载着经济史上的事实,闽粤地区有番薯、番椒、番柿、番石榴、番黍,北方地区也有胡椒、胡豆、胡萝卜、胡瓜,说明这些作物最初都是域外舶来品。某些名称寄托了人们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怀念,福州的光饼、征东饼是纪念平倭英雄戚继光的,为了纪念孙中山,各地有中山路、中山公园,服式有中山装。有些异地同名的地名和方言岛的存在则往往成为集体移民的历史见证。语言中的避讳反映着曾经存在过的禁忌习俗。亲属称谓往往和历史上的婚姻制度相关,社会称谓常常表现不同的时代风尚。“底层”现象和借词则说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也可以进行宏观的考察。例如语言有抽象的语言体系和具体的言语变体,文化则有社会共同的规则 and 不同个体的行为反映,它们二者的存在形式就值得比较。语言有横向线性的组合关系,也有纵向的聚合关系,文化的系统也是多种子系统整合而成的,这种整合之中有传统的选择、改造或扬弃,也有变异和创新。语言的深层结构往往更多体现超时空的共性,其表层结构则更多属于一定的民族的、地域的或时代的个性,文化也有全人类共同的特点和民族、地域、时代所具有的特点之分,这都可以从结构形态上进行语言和文化的比较分析。

福建是以方言繁多而著称的省份。在众多的方言中,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而这些语言类型差异又是和社会文化类型差异直接相关的。本文试就福建境内的方言类型和文化类型作一番初步的研究。这种类型分析也是一种宏观的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的考察。

福建方言的分区

经过多年来的调查,福建境内的方言可以分为五大类、七大区、四小区。

五大类：除闽方言、客方言、赣方言（下详）之外，还有吴方言（通行于浦城县城南浦镇以北大半个县）；以及两个官话方言（或称北方方言）岛：南平市区“土官话”和长乐县洋屿满族乡的“京都话”。

七大区：（1）闽东方言区：分布于福州市及宁德地区所属18个市县，以福州话为代表。（2）闽南方言区：分布于厦门、泉州、漳州三市所属22个市县及龙岩地区的两个市，以厦门话为代表。（3）莆仙方言区：分布于莆田市所属3个区县，以莆田话为代表。（4）闽北方言区：分布于南平市所属大部分地区，以建瓯话为代表。（5）闽中方言区：分布于三明市所属的列东区，列西区，永安市及沙县，以永安话为代表。（6）闽客方言区：分布于闽西的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宁化、清流等7县，没有明显的代表点，相对而言，长汀话各县的人较为好懂。（7）闽赣方言区：分布于闽西北的邵武、光泽、建宁、泰宁等4市县，邵武话较有代表性。

以上（1）至（5）区属于闽方言。在五个闽方言之间有一个小过渡区，包括大田城关话（又称前路话）、尤溪城关话及大田、尤溪、永安、沙县交界地带的“后路话”，以及其他一些乡镇的话，是一个兼有闽方言各区特点、且差异较大的土语群。在闽方言和客赣方言之间也有一个过渡区，包括顺昌（西部南部）、将乐、明溪三县，兼有闽方言和客赣方言的特点，其中，明溪话有更多客方言特点，有人归为客方言区，顺昌话则有更多闽方言的特点。

福建方言的文化类型

语言的分化和整合，方言差异的大小，方言演变的快慢，在社会生活中方言交际功能的兑现效果都和社会的文化历史背景直接相关。考察方言演变的现状和社会文化的关系，是“外部语言学”，也可称为文化语言学。把方言演变的现状归纳为若干类型，探寻它与社会文化类型的关系，便是方言的文化类型研究，也可称为方言的社会类型研究。下文将从共时差异、历时演变和功能效应三个方面对福建境内的方言作一概略的类型分析。

（一）向心型和离心型。就共时差异说，福建诸方言有向心和离心两种类型。向心型方言内部差异小，方言意识强，有明显的中心——代表点方言，方言区域的边缘比较清楚，与别区交界处常为双语过渡；离心型方言内部差异大，方言意识弱。无明显的中心，方言区域边缘比较模糊，与别区方言常呈渐变过渡。

闽方言中沿海三区是向心型的，各自的内部差异较小，区内都可通话，一般人都有明确的方言意识和认同感，知道本地话属于何种方言，以什么话为标准。福州话、厦门话、莆田话在本区内有较高威信，对各地小方言有明显的影响。如福州话在闽东方言区内18个县市八百万人中大体可以通行，各地虽有方言歧异，多以改口学福州腔为荣。闽南方言区的诏安、平和、南靖西部与闽客方言连界，交叉地带兼通闽南话和客家话；仙游县南乡和惠安县北乡兼通闽南话和莆仙话。福清县南和莆田县北则兼通闽东话和莆仙话。内陆两区闽方言则属于离心型方言。闽北方言东西两片（建瓯、松溪、政和为东片，建阳、崇安为西片）之间难以通话，南端的浦城南郊石陂和南端的南平市郊及顺昌东南郊也不易通话，区内没有明显的认同感，民间也没有“闽北话”之称。建瓯历史上虽为府治所在地，但建瓯话对区内方言并未产生标准语的影响。闽中方言由于区域小，内部大体可以通话，但彼此差异甚大，也没有明显的代表点，民间更未有“闽中方言”之称，由于其他地区人都很难听懂，民间曾有“怀得知”

(听不懂)话之谑称。在闽中、闽北之间是渐变型的过渡,没有明显的边界。从南平、顺昌到沙县,过一个乡差一点,邻乡之间又大体可懂。

闽赣方言只有四县市,也是“各自为政”,彼此差异较大,难以通话。没有形成过中心,府城邵武话在各县并无高威望和大影响,也没有区域方言的观念。西北部与赣方言连界,可以通话,东部南部则边缘模糊。和闽客赣过渡区之间也是渐变型的。

闽客方言又分南北中三片,南片上杭、永定、武平之间较为相近,与粤东客家话可以相通,有较明确的客家意识。北片宁化、清流较为接近,但与南片有较大差异,通话有困难,已无客家观念,长汀话由于兼有南北片特点,历史上又是府城,音系简单,南北片的人较为易懂。连城县内口音特别复杂,有互不通话小方言六七种,是客家方言典型的离心型地区。

两个过渡区也是典型的离心型方言区,一县之内常有几种口音,甚至不能通话。

(二)稳固型和变异型。就历史演变来说,福建诸方言有稳固型和变异型两种类型。稳固型比较保守,变化慢,新老派口音差异小,对于别的方言和共同语是封闭的,不易受影响,其方言特点比较单纯,方音与古音的对应比较整齐;变异型方言变化较快,往往有明显的新老派口音差异,对别区方言及共同语是开放的,易受影响,其方言特点常是多元(多来源、多层次)的,甚至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混合体,因而方音与古音的对应常不整齐。从总体上说,历史演变的两种类型和共时差异的两种类型又是相应相关的,向心型方言较为稳固,离心型方言则多变异。

闽方言中,沿海三区是稳固的。三百年前所编福州话韵书《戚林八音》和现代的福州话并无太大区别,至今还被闽剧艺人用作合辙押韵的依据;一百多年前的泉州话的《汇音妙悟》、漳州话的《十五音》和现今闽南话也无重大变动,明末传下来的《荔支记》(后称《陈三五娘》)唱本,闽南人还大体可以读懂。这三区方言所受别方言及普通话的影响都不大,就语音说,现代方音与古音音类的对应都比较整齐。就用词说,四十年来最通行的称呼“同志”在厦门还常说成“友的”,在福州话则有新造的方言词“依志”来表达。迁居二三百年的台湾同胞回闽南探亲寻祖依然乡音未改,这怕是中外古今所少见的。闽北、闽中两区则显然属于变异型。相对而言,建瓯话和永安话变化较慢,其余县市新老口音往往有很大差别,年青人甚至说不清本地话,闽江上游两岸各县的闽北方言深受闽东方言的影响,如沙县的“变韵”就显然是从福州话来的。各地受普通话影响更大,由于对外“开放”,兼收并蓄,这些方言与古音对应关系都比较杂乱。

福建境内的客赣方言中,闽西南片的典型客方言较为稳定,闽赣的建宁话也比较保守,这显然是因为它们与客赣方言连片并且交往也多。其余地区变异都比较多,对外也是“开放”的,受相邻的闽方言和普通话的影响都较大,因而与古音对应繁复。词汇上也有同样的反映。

两个过渡区的方言都是不同程度的混合体。顺昌、将乐、明溪兼有闽、客、赣的特点,大田、尤溪各区则含有五区闽方言的不同特点。

(三)扩展型和收缩型。就功能效应说,福建境内的方言有扩展型和收缩型之别。所谓扩展型,表现在方言的分布上是自本土向外扩展,流播面广;表现在现实应用中,不论是语用场合或语体类型都比较周全,方言与普通话是双语并用,对内对外有所分工。所谓收缩型则是流播地域表现为收缩状态(受别方言“蚕食”、同化),使用场合和语体类型都比较狭

窄，普通话逐渐取代着方言。

闽方言中，闽南方言是扩展的典型。数百年来，闽南方言随着闽南人的足迹走遍东南沿海，横渡台湾海峡，占据海南全岛，远涉东南亚各国。论语用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各个社会生活领域都可通行无阻；论语体，口语之外书面语有完整的文读系统，艺术加工则有戏曲（梨园、高甲、打城、芗剧等剧种）、木偶、说唱（南音、锦歌）等多种文学形式，人们普遍以自己的方言为最好的表情达意的工具，因而普遍使用双语——对外说普通话，对内说方言。在“扩展”的性格上，莆仙方言与闽南方言可谓并驾齐驱，从潮汕地区到雷州半岛、海南岛，民间多有“祖上自莆田荔支村迁来”的传说，东南亚各地也不乏莆仙话足迹，莆仙戏为莆仙话所作的艺术加工也是享有盛誉的。闽东方言的扩展稍逊，其境外流播主要是沿闽江上溯，扩展了几个乡镇，从语用和语体说也是周遍的。其文学加工形式除戏曲（闽剧）之外，说唱还有伬唱（以唱为主）和评话（以说为主）之分。闽北、闽中方言在功能效应上则明显呈收缩趋势。这一带普通话都已普及，连农村集市上普通话也可通行。由于缺乏文学加工形式，要表达繁复的思想感情，人们常常会感到方言不如普通话得力，以致逐渐收缩方言使用范围，有些青少年、儿童不愿意说本地土话，甚至不会说流利的本地话，象拥有三十万人口的现代工业城市三明市区，能说地道的原来的三元话的据说已不足万人了。

在客赣方言和两个过渡区中，除南片客家话（武平、上杭、永定）外，大都也属于收缩型方言。主要表现在逐渐缩小方言使用范围，象连城、大田、尤溪这些方言复杂的县分，人们早已采用普通话交往。缺乏方言文学形式，书面语难于用方言表达。

无论是共时差异、历时演变或功能效应，两种对立的类型都是相对的，并有不同的程度之别，如果把这些不同的类型差异在各方言区的表现加以程度的区别，各方言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综合表现出来的“性格”。据以上简略分析，福建境内七个方言区的三种文化类型差异可用下表来说明：

方言区	类别 差等	向 心 —— 离 心			稳 固 —— 变 异		扩 展 —— 收 缩		
		内 部 差 异	代表点 权威	方 言 意 识	演 变 速 度	外 来 影 响	区 外 流 播	语 用 广 度	文 学 加 工
闽东方言区		-	+++	++	---	---	++	++	++
莆田方言区		--	++	+++	--	--	++	+++	++
闽南方言区		-	++	++	--	--	+++	+++	+++
闽北方言区		++	+	--	+	++	-	+	-
闽中方言区		+	+-	--	++	++	--	-	-
闽语过度区		+++	--	---	+++	+++	---	-	---
闽赣方言区		++	---	-	++	++	--	--	--
闽客方言区		+-	+-	+-	+	+	+	+	+
闽客赣过度区		++	---	---	++	++	--	--	--

福建文化类型区

一定的地域，由于有着相同的自然环境，往往又有着相同的民族来源或长期共同的社会

生活经历，人们便组成了一定的社会群体，从而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形成许多共同的特点。不同的地域之间，由于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同异，也由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地域文化总会显示差异。就这些差异进行比较，便可归纳出不同的类型。以下试将福建文化划分为四个类型区，逐一考察其主要特点及其与方言类型区的关系。

（一）闽东的江营文化。闽东地处沿海，南有闽江及其支流古田溪、梅溪、大樟溪，北有洋头溪、霍童溪和连江各自直流入海。由于上游雨量充足，这些江河流流量较大，河谷地带和冲击平原也较为开阔，和其他地区相比，历来的人口分布还不算稠密，大多沿水聚居，广得江河海域之利。高山区均少开发，沿河除种稻米之外，素有种植柑桔、茶叶的传统，沿海则有近海捕捞和滩涂养殖之业。闽江内河航运可通二十个上游县，福州足可汇集北半个省的土特产。山区林木结排漂放，源源不断，供沿江建构木屋民居，并为马尾造船业提供充裕原材料。闽江口对外贸易兴起之后，又有传统工艺脱胎漆器、寿山石雕、茉莉花茶及角梳的出口。因此，除闽东腹地山区之外，沿江沿海一带经济生活较为富足，社会也历来较为安定（仅明代有倭寇骚扰）。五代王审知“四门设学”之后，文化较为发达，是全省政治、文化中心，闽东人自有仕宦、笔耕之便，人民的职业取向力取“抱稳”，上层不夺魁首，有“老爹老爹，破布之遮遮”（意为学无专长的官员多清贫）之谚，近代以来海关、邮电、银行、警察、宪兵等职业几为闽东人所垄断，下层则重手工艺，求稳定收入，从事烹调、成衣、理发等行业的“三把刀”十分普遍。冒风险向外发展的需求较小，外海航运及海外迁徙规模不大，明末36姓定居琉球，后有福清人南渡印尼，闽清人开发婆罗州，长乐人横渡美洲，均批量较小。

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闽东方言便成为典型的稳固、向心型方言。福州话在全区享有地域标准语的威信。拿《威林八音》所反映的语音系统和现今福州话比较可以发现，三百多年过去了，福州话的声韵调系统几无变化。文学语言发达，拥有丰富的词汇和成语俗谚。某些方言词语颇能反映本地社会心理。例如：“鸡有鸡米，困有困粮”，“腹枵莫共饱人讲”，“丝线会牵磨盘转，蛎壳会舀槁干”，是鼓励人自信、奋发的。“会划会算，买饼当顿”，提倡有计划过日子——“做家”。“合式”意指合算，占便宜。“贪便宜，去倒长”，告诫人们莫要贪小便宜。“吃亏”意指难受。福安一带箸与短同音，避讳说“筹”，这是商业意识的反映。“死”说成“生”，“该死”说“唔使死”，灯火熄灭说“暗去”，烛点完了说“继”，卵（蛋）与乱同音改说“太平”，吃药说“食茶”等等，则反映了求稳怕乱，畏惧凶险的社会心理。在方言的扩展上，闽东方言也是沿闽江上溯，占据部分江滨乡镇或作为沿海城镇的第二方言，体现了江营文化的特征。

（二）闽南的海播文化。这里说的闽南海播文化区包括闽南方言区和莆仙方言区。历史上东晋南迁之后，中原汉人就陆续移居闽南，晋江就是东晋先民思念故国而命名的。当时这一带自然条件应是相当好的，土地肥沃，气候宜人，不但可以种植水稻，还盛产荔枝龙眼等各种水果。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载，盛唐开元年间，泉、漳二州的七个县就有人口5万多户，占全闽5州23县总户数的一半以上。由于人口发展过快，土地过度垦殖。这里虽有晋江、九龙江和木兰溪等河流，因山低水短，流量不大，年均降水量相对偏少，常闹旱灾，土地逐渐沙质化，丘陵之间多望天田和旱地，沿海又多沙滩，少海涂，很快就显得人多地少，资源不足。唐宋以来，闽南人民就向海洋谋求出路了，这就是海上的播迁，故称海播文化。

闽南的海播文化可分为近海的播迁和远洋的播迁。就近海说，宋代以后，不少人沿海岸线向南迁往广东向的潮汕平原、海陆丰、雷州半岛并渡过琼州海峡登上海南岛。明末南安人郑成功驱除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随之东渡开发宝岛的十多万人大都也是闽南人。清初以后还有一批沿海的渔民和农民沿海岸线北移，在闽东的霞浦三沙湾，福鼎沙埕湾乃至浙南苍南、平阳、玉环、舟山群岛一带落户定居。可以说，祖国东南部的闽、浙、粤、台、琼五省的海岸线大部分为闽南方言所占据。至于远洋的播迁，最早是与宋元泉州港的兴起相关的。当时的刺桐港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的造船业和对外贸易达到鼎盛，内地的烧瓷和制茶等手工业也得到刺激，迅速发展，安溪的茶叶和永春德化的瓷器早已大宗出口。泉州港没落之后，又有九龙江口的月港在明代繁荣一时，后来的厦门港则是五口通商口岸。可见，闽南的远洋航运和外贸始终未曾间断，数百年间，闽南人向东南亚的移居也一直没有停歇，“过番”、“出洋”在闽南地区被认为是好汉行为。为了壮出海人的胆，莆田人还创造了自己的浮海女神——妈祖，在东南亚海域一直受到亿万华人华裔的崇拜和祭祀，估计目前定居在台、港以及东南亚各国的闽南人后裔约有三千万，早已超过了闽南本土的人口。

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闽南方言便成为汉语方言中向海外流播最广的方言。在闽南方言中有许多反映海播文化的语词。“番薯”相传是从菲律宾引进的。“番椒、番石榴、番大麦、番仔荔支、番仔火（火柴）、番仔衫（连衣裙）”等也反映了闽南与南洋的经济交流。

“番客”、“过番”娶“番婆”、生“番团”、“番客婢”留在“唐山”靠“番银”顾祖公的香火，都是侨乡常见的社会现象。远渡重洋在靠季风乘木船航行的年代，自然是“行船走马三分命”，没有不怕死的奋斗精神是无法坚持下来的。在闽南话里关于“死”并不避讳，亲爱者可以骂为“死鬼”、“死团仔”、“死婆姐”、“短命”等。“敢死提去食”、“一支草一点露”、“东洋无洋过西洋”、“输人唔输阵”、“穷无穷根，富无富种”、“骨力（勤劳）无惊穷”等，都是闽南人的信条。出洋之后，开头难免要“把草寻亲”，在老乡宗亲处“浪邦”（依人糊口），慢慢地靠“好信用”，讲究“天理良心”，“挣人甘愿钱”，办起事业是“犁头戴鼎”，遇到灾祸是“喙齿拍折连血吞”（牙齿打断了连血咽下去）。在外面一旦发迹，便要回乡“耀祖荣宗”，私家是“买田、起厝、烧大金、做功德”，于公家则有“修桥造路、办学堂、起宫庙、积阴德”的传统。凡此种种，许多社会心理和习俗都在方言中留下大量记录。

（三）闽北的山耕文化。这里所说的闽北是地理概念，也是历史的概念。除含闽北方言区外，还包括闽中方言区，闽赣方言区和闽客赣过渡区。从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说，这几个方言区的特点是相近的。闽北原是福建开发最早的地方，这里属于武夷山脉的中低山地，闽江上游的几条支流（建溪、富屯溪、沙溪、金溪）呈扇形分叉密布，虽然河谷地带不如下游开阔，但山体多红壤、少沙石，加以雨量充沛，山地植被历来较好，还是宜于农耕之地。两汉以前，江东人和南楚人就来到这里开发。东汉末年，福建境内最初设置的五个县中，闽北占了四个。东吴垦发江南，闽北人口骤增，公元260年置建安郡，不久之后分立晋安郡，两郡各有4300户，当时闽北的人口占全闽的一半。两宋期间，闽北鼎盛。“建瓷”广销海外，

“建茶”誉称朝野，铜银冶炼举足轻重，建阳麻沙是全国出版业中心。程、朱理学在此发展成庞大精深的体系，使儒学发扬光大并再度获得思想上的绝对统治地位。二三百年间，名臣大家如群星灿烂。元以后，全国政治中心北移，福建经济中心则转向沿海，加上数次大规模

的农民起义被镇压，人口锐减，农田荒废，百业凋零，闽北的经济文化逐渐衰落。此后数百年间，闽北一直处于封闭式的封建自然经济之中，人们在山下开田插秧，种瓜种豆，到山上采集菌子榛子栗子，在家里养猪养鸡纺纱织布，大体都能自给自足。又因交通阻塞，分散的村落老死不相往来，唯有旬日之间的墟集，并无城镇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生活但求温饱，仕宦之途也十分冷落。

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各区方言迅速变异，日益显得离心分散，逐渐形成了许多互不通话的小方言，各方聚集的“新移来住人”带来了外地方言，主客异音，融为一体。闽赣方言区由于大量江西人移居，自闽方言蜕变为赣方言，闽客赣过渡区则混集了三种方言特点，过邑异音。明末形成的南平土官话以及后来的普通话，乃至抗日战争内迁避难的福州人说的闽东方言，都对闽北山区诸方言发生一定的影响。因而闽北的几种方言在古今语音对应上显得层次繁多，变异复杂。安土重迁，求稳怕乱，恪守旧章，安贫乐道的社会意识在方言谚语中亦有许多反映。“人比人气死人”，“闲事莫管，白饭食三碗”，“打架莫向前，做客莫退后”，“忍气生财”，“好心被狗咬”是劝人安分守己，勿为祸首，勿为福先；“有菜莫食蔬，有堦（路）勿坐船”，“懒人有懒福”，“做了三年化食（乞丐）皇帝不想当”则劝人勿冒风险，在贫困中寻安乐。显然，这其中也有宋儒们安贫乐道，默坐澄心，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影响。

（四）闽西的移垦文化。福建各地的开发，闽西最迟，闽西的开发是客家人迁入的功劳。唐代中末叶，特别是黄巢起义之后，长江中下游和赣北地区成为主战场，民不聊生，在那里立足未久的中原南下流民又开始了新的迁徙，主要的途径便是沿赣江南溯到赣南，越过宁化石壁村到闽西一带避难。两宋三百年间，沿着宁化通道，布满闽西各地，并继而向粤北粤东迁徙。后来入粤的客家所编族谱，十之八九都有唐代中末叶经由“宁化石壁村”入闽的记载。闽西地区山无闽北高，纬度更低，无霜期更短，汀江纵贯南北，论自然条件应不比闽北差，否则也不可能成为客家人迁居的福地。然而从中原南下的客家先民，虽有较之土著更高的文化，然而在耕营山地上则是经验十分缺乏，于是在和土著畬民共处乃至融合的过程中，学到的却是“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这是一种掠夺型的移垦，毁林种粮，水土流失，耕地贫瘠之后复又移居别处。久而久之，闽西赣南成了植被稀疏、水缺地瘠的贫困山区。由于受畬族移垦文化的影响，在闽西客家地区“男耕女织”的习俗也发生了变化，妇女为了便于务农和操持家务，历来保持天足，无缠足陋习；男子多外出从事手工劳动。男女对答山歌也和畬族风俗雷同。但在精神文化方面，客家人却又固守着中原故土形成的传统，华夏源流、中原土族的意识十分强烈，各姓氏都经常续编宗谱，对死去的祖先重祭祀，乃至背着骨殖四处播迁。活着的亲人则按辈份长幼有序组成大家庭，按血缘族姓聚结村落，同姓同宗的族人筑土楼围居是常见的居住形式。于家族宗姓论孝，于国家朝廷论忠，遇有异族统治，反抗性特别强烈，蒙古人入主中国，满族人建立清廷，客家人都组成维护前朝的劲旅，随亡命的皇帝逃难，不惜血战到底。由于生产门路狭窄，重农轻商，农业中除粮食种植和家庭养殖，更无他途，手工业亦不发达。在生活上，客家人不重开源而尚节流，崇尚勤俭节约，特别能吃苦耐劳。为了维持传统文化，各族姓普遍重视文教，在不多的耕地中总要划出较好的洋田，作为赞助读书子弟的学田。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客家方言一方面是随着山川阻隔而造成某些歧异，带音离心的倾

向，另一方面则遵循着“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古训，带着稳固的趋向。各地方音与中古汉语都有较为整齐的语音对应，词汇上也相当保守。闽西客话明显分为两片，北片清流、宁化、连城因为是早期迁入的，与早来汉人及畲民相处，对外交往少，客家意识较弱，内部歧异大。南片长汀、武平、上杭、永定等县属汀江流域，因为又作为向粤地播迁的起点，靠着汀江动脉，与粤地客家往来较密。入粤客家在明清两代与广府人的主客斗争中形成了更为强烈的客家意识，也逐渐接受着江海文化的影响，这种强化的客家意识和江海文化的新成分又回头影响到这一带。相对而言，南片方言更多向心趋向，与客家中心地带梅州地区更为接近。

各种传统观念风俗习惯在客家方言中的反映也是比较集中和强烈的，由于遵循“宁卖身，莫卖音”的戒条，有的村庄不但不同族姓的人分地而居，而且口音也按姓而别，这种情况是其他方言区所少见的。“拳头向外打，手指向内弯”是宗族团结对外的信条，“命长唔怕家乡远”是移垦制度提炼出来的俗语，“饶人唔系痴汉，痴汉唔会饶人”是叫人奉行中庸之道的格言，“无商不奸”，“冤枉钱，水流田，血汗钱，万万年”则是重农轻商的见证，“坐成懒，睡成病”，“多衣多寒，无衣自暖”，“茅寮出状元”，“住久成美都”等劝人勤劳节俭的谚语就更多了。

方言和文化都是历史上形成的，各类型区的特征是千百年的社会生活熔炼出来的，本文的分析只能取材于历史。数十年来，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变化更快，文化类型和方言状况也正经历着新陈代谢。不过，回顾历史，辨识其烙印，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定然是大有裨益的，这也就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上接第66页）

/但毒蛇是没有声音的”，等等。

笔者认为，艾青这几年小诗创作中最出色的还是这一类能给人以充分的美感，且诗味隽永的咏物诗和哲理诗。诗人常常化腐朽为神奇，从独特的角度，以独特的发见，使抽象的事理变得触手可摸，又使具体的景物有了更深邃的意境，他无愧于一个高明的语言艺术家的称号。小诗《绿》在语言运用上是别有情趣的。作者于1979年2月住广州迎宾馆。虽然已属深冬季节，但南国却一片郁郁葱葱。艾青这样形容南方的景色：“好像绿色的墨水瓶倒翻了/到处是绿的……/哪儿去找这么多的绿/墨绿、浅绿、嫩绿、翠绿、淡绿、粉绿/绿得发黑，绿得出奇/刮的风是绿的/下的雨是绿的/流的水是绿的/阳光也是绿的/所有的绿集中起来/挤在一起/重叠在一起/静静地交叉在一起/突然一阵风/好象舞蹈教练在指挥/所有的绿就整齐地/按着节拍飘动在一起……”这首诗写出了“绿”的极致，既给人以动感，又做了静态的描绘，既是写实的，又幻化为一片想象的世界，动人极了。此外《回声》、《希望》、《梦》、《跳伞》、《跳水》、《仙人掌》、《虎斑贝》、《天池》、《冰洞》、《天鹅》等也都是十分精美的小诗。艾青的“一叶诗”是有常青的艺术魅力和长久的生命力的。

1991年7月于阳光寓所